

冷战与 新中国 外交的 缘起

1949-1955

THE COLD WAR AND ORIGIN OF
DIPLOMAC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55

牛军 / 著

〔修订版〕
Revised edit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PRESS

冷战与 新中国 外交的 缘起

1949-1955

.....
THE COLD WAR AND ORIGIN OF
DIPLOMAC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55
.....

[修订版]
Revised edition

牛 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1949~1955/牛军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

(近世中国)

ISBN 978-7-5097-4153-5

I. ①冷… II. ①牛… III. ①外交史-中国-1949~1955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9528号

· 近世中国 ·

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1949—1955 (修订版)

著 者 / 牛 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徐碧姝 宋 超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吴 铭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25.6

版 次 / 2013年1月第1版


字 数 / 445千字

印 次 /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153-5

定 价 / 5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001
第 1 章 从内战走进冷战	026
“蒋之下的和平”	028
大国角逐中艰难抉择	048
铁幕落下之时	090
第 2 章 结盟与对抗	132
“一边倒”	135
结盟的缘起	155
走向对抗之路	192
第 3 章 东亚革命与国家安全	219
天下解放与国防线	220
援越抗法	235
跨过鸭绿江	273

第4章 走向“冷战共处”	329
实现朝鲜停战	334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363
台海“打打谈谈”	411
第5章 缔造新外交	444
“搞一点原子弹”	446
重建“中间地带”	461
结 语	487
参考文献	491

Contents

Introduction	/ 001
Chapter 1 Involved into the Cold War through The Civil War	/ 026
“Pax Chiang Kai-shek?”	/ 028
Hard Choice in the Powers Competition	/ 048
When “Iron Curtain” is Falling	/ 090
Chapter 2 Alliancey and Confrontation	/ 132
“The Two Great Camps”	/ 135
The Origin of Alliance	/ 155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 192
Chapter 3 Eastern Asia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 219
“World” Liberation and National Defence	/ 220
Assistance to Vietnam against France	/ 235
Crossing Yalu River	/ 273
Chapter 4 Toward “The Cold War Co-existence”	/ 329
To End the Korean War	/ 334

To Restore the Peace in Indochina	/ 363
“To Wield both Cannonades and Negotiations” at Taiwan Strait	/ 411
Chapter 5 Making New Diplomacy	/ 444
“To Produce Some Atomic Bombs”	/ 446
Reconstructing “Middle Zone”	/ 461
Conclusion	/ 487
Bibliography	/ 491

绪 论

1947年9月22日是国际冷战历史中一个特殊的日子。世界的目光都在这一天投向欧洲，为将世界分成两个相互对抗的集团，美苏之间的交锋在那里走向转折点。

这一天，有欧洲的英法等16个国家参加的欧洲经济会议在巴黎签署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总报告。该报告强调，美国援助对欧洲战后复兴特别重要，所以必须与美国建立各种紧密的关系。^①此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 M. Molotov）曾在巴黎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上警告英法两国，不要接受美国不久前抛出的马歇尔计划，倘若在此问题上一意孤行，就会“把欧洲分成两个集团”。^②事实表明，他的警告无济于事，不过苏联显然也做好了从另一边撕裂欧洲的准备。

也是在这一天，在波兰的西里西亚什克拉尔斯—波伦巴的小温泉场召开了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和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代表

^① 参阅《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4页。

^② 参阅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45—1949）》第七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134页。

等参加的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布，世界上出现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为了世界有一个光明的前景，后一个阵营要敢于起来斗争。^①

就这样，欧洲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就差将德国在地理上一分为二了；“两大阵营”也被宣布出现了，世界在政治上也被一分为二了。美国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将战后世界政治的这种发展名之为“冷战”，这个词被普遍认为是最准确地概括了战后一个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并因此很快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且沿用至今。冷战结束后，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还被称为处于“后冷战时代”，可见这个词影响之大之久远。

1947年9月14日，也就是“两个阵营”的出现被宣布一周之前，中国河北省武安市附近一个叫陶冶的小镇子上印发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当时还只是中共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的机关报。这天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人民解放军大反攻》。这篇社论宣布中共军队“伟大的反攻已经开始”，他们要“把解放的旗帜插到全中国”。^②这时，世界上那些最睿智的政治家都在绞尽脑汁，试图更深刻地诠释欧洲局势的影响和“两大阵营”还会在那里干些什么。还有不少人忧心忡忡，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将降临。总之，就是没有人意识到《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所阐述的事变意义有多重大。在东亚那片与欧洲规模几乎相当的中国大地上，国共军事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共军队已经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目标是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新的国家将在两年后诞生。如果论规模和尺度，这就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小的地区在经历多年战乱和四分五裂之后实现了大一统。另外，中共夺取

①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8页。

② 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1947年9月14日，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下），中国人民大学1981年印，第23页。

政权还导致中国外交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新国家以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方式彻底摧毁了以往的中国对外关系体系，并给世界政治造成了剧烈的震动和相当长久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篇文章。

从微观层次上看，在东亚东北部地区的陶冶镇上发行的那张《人民日报》与在西欧的巴黎和东欧的西里西亚什克拉尔斯—波伦巴小温泉场两地分别举行的国际会议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全球冷战的爆发与中国政局巨变在时间上如上述之高度的重合似乎只是个巧合。但是，从全球历史的长时段观察，这种偶遇很难说是没有关联性的，它相当直观地展示了美苏对抗将溢出欧洲，延展到东亚。冷战早晚会全球化，中国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地同国际冷战的进程纠缠在一起，未来中国的对外关系必定要面对“冷战”这个战后世界的基本格局，在同冷战的互动中发生和发展。与此同时，新的国家也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诉求塑造冷战，至少最初在东亚地区是如此，随着时间的发展则逐步扩展到要塑造全球冷战格局。这本书论述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这个历史过程的最初阶段。

这本书将要叙述的“新中国外交”是1947年的世界与中国两方面形势发展的结果，在时间上主要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1955年，差不多就是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这个时期。这个时期不论是在世界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中，都是可以清楚识别出来的。这是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的巨变过程恰好重合在一起的时期。

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1953年3月斯大林（J. V. Stalin）逝世，是冷战对抗最为极端的阶段。当时美苏两国处于极其紧张和近乎僵硬的对抗之中。在欧洲是1948年6月爆发柏林危机及随后的德国正式分裂，以美国为核心的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以及欧洲东西两边的所有联系中断。在亚洲则是爆发了朝鲜战争，结果不仅是朝鲜半岛分裂长期化，而且还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蔓延，形成了两大阵营在欧洲之外的另一条激烈对峙

的战线，在这里中美持续进行了三年的热战。极端对抗的局面在斯大林去世后开始逐步缓解，美苏双方开始调整此前连通过谈判寻求妥协都不愿意的态度，这导致了局部和短暂的缓和，直到1956年在东欧和中东发生的危机打断这个进程；中国这时则迈开了改造冷战的步伐——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书要论述的时间范围。

就在美苏步入尖锐对抗并在斯大林去世后东西方关系一度趋向缓和的这个时期，中国政局正在经历极为剧烈的转型，即从中共取得革命运动的最后胜利转向建国。这个转型的过程难以划出截然分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发生的革命与建国是不可拆分的联合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也伴随着这场转型而诞生，并在与国际冷战的互动中塑造出自己的基本形态。

在国内外两个历史过程紧密交织的结构中，在中国对外关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同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相比，被命名为新中国的这个时期发生重大事件的密度和重要度都是最高的，中国领导人做出的或不得不做出的重大决定之多令人目不暇给。它们包括中苏结盟、中美对抗、援越抗法、抗美援朝、印度支那地区停战谈判、处理东南沿海危机、参加万隆会议，等等。这些如此密集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中不乏惊心动魄的，对后来中国、东亚地区甚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巨大，有些决策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如此丰富和壮观的历史场景的确引人入胜，为再现这幅画面付出努力确有其价值，这也是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变得如此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

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探讨新中国外交是如何发生的，给当时的中国和世界造成了什么影响，给中国对外关系留下了什么遗产，等等，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会发掘出更为丰富复杂的含义。在经历了60个春秋，尤其是经历了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堪称革命性的变化之后，当代中国更需要且比以往更有可能从更广阔和深远一些的视角来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更清晰地呈现其主要的特征和影响，从而帮助中国人更准确地界定在今天的世界

上“我们”是谁，同“他们”到底曾经有过什么不同之处。

从当时的历史情境看，一个简单明了的现象就是新中国外交的发展演变同冷战的起伏基本上是同步的。这个简单而又基本的事实决定了研究新中国外交缘起的外部环境。因此，要叙述它与世界政治之间的互动，首先要界定清楚它与冷战的关系。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解放军口号”，公开宣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①以中共中央公开宣布其夺取全国政权的标志，国共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了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可能性。中共中央有关对外政策的阐述则初步昭示了它取得全国政权后的对外政策倾向。在中共中央同时公布的八项政策中，第八条阐述了对外政策，大致反映了在后来的逐步发展中变得更为丰富的主要原则，即“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以及“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②从那时起，有关国家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面对一个在激烈的社会革命中崛起的新国家及其对外政策。

虽然冷战后有大量的历史档案被发掘出来，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找到证据可以表明，美国、苏联和其他主要国家此时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共中央对中国时局的上述阐述，甚至这些国家很可能还都不知道中共中央的这一宣言，遑论去解读其含义和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些国家都有各自的理由相信，中共不可能在短期内夺取全国政权，并在一大片被长期的大规模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废墟上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新国家；尤其是难以相信这个新国家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和能力，摧毁近代以来就是由列强建构的东亚秩序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1947年10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51页。

^②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8页。

的基本框架。

就在1947年3月间，胡宗南的军队还喊着“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的口号占领了延安。谁能想到没过多久，中共军队就喊着“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跨过长江，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延安易手不久，当时同中共中央保持着联系的苏共中央还电询中共中央，撤离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是否有必要到莫斯科去政治避难。莫斯科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苏联驻华官方机构的分析。那些机构的代表都认为，中共领导人的战斗言论包含宣传的成分，他们没能准确估计国共国内的力量对比。11月15日，在南京的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A. A. Petrov）对前来话别的周恩来来说，中共中央并不总是客观地评价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周恩来告诉他应当把国民政府在纸上存在的力量与它的实际力量区分开来。^①

毛泽东当时的确表示过愿意去莫斯科，中共中央还计划过在坐落于华北吕梁山北端的山西岚县修建一个机场，以方便双方人员往来，包括在必要的时刻方便毛泽东去莫斯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希望去莫斯科绝不是为了政治避难，因为他这时已经足够英明地洞悉国共战局在发生根本性的转折，中共军队正在取得战略主动权。后来斯大林了解了中国形势后，却没有接受毛泽东访苏的请求，他可能是担心毛泽东这时会给莫斯科带去尚难预料的麻烦。^②他可以接受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作为政治难民去莫斯科避难，后来却对接待一个胜利者那么勉强——这多少反映了斯大林有一种很奇怪的心理。

历史学家相当详细地挖掘了美苏的历史档案并尽可能地条分缕析，以便讲出一个个逻辑清晰的故事。但是在很多年以后的今天已经可以大致确定，所有那些被历史学家按照合乎逻辑的方式叙述的美苏对华政策等，都应该被置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即美苏正在

^① 陈晖：《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152页。

^② 参阅《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248页；〔俄〕尤·米·加列诺维奇：《两大领袖斯大林与毛泽东》，部彦秀、张瑞璇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38页。

欧洲进行尖锐的对抗，加之处理对华关系的历史惯性，它们的领导人在应对急剧变化的中国政局时，基本上都是既缺乏热情又措手不及的；它们的政策至少不能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们之间的差别更多的是源于它们各自对华政策的历史和它们分别同国共两党的关系的历史，在现象上则表现为两个国家的政策调整有早晚之分。必须说明这一点，是因为后来东亚地区国际政治的演变同这样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即在新中国外交同全球冷战体系（或者说全球冷战体系与新中国外交）的互动中，存在着大量因决策者无经验、不重视、认知准备不充分甚至是盲目等主观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和负面影响。对于卷入其中的决策者来说，在认知过程中的确存在着许多毫无经验的尝试和探索。

反观中共领导人，他们在处理外交问题时又何尝不是处于类似的仓促之中？毕竟内战的胜利和建国的重任到来之快对他们而言也同样是始料不及的，遑论由此引起的外交问题，相对而言这是一个他们最不熟悉的领域。他们为应对国际冷战体系的各种考虑和政策包含着为达到既定目的仔细算计，但在国内外各种复杂、快速且有时是剧烈的相互冲击中，他们的确也是在不断摸索、试探和观望。导致新中国外交后来的发展状态的一部分原因是那些卷入新中国外交建构过程的历史人物之间独特的互动。这构成了冷战与新中国外交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中共中央1947年10月10日宣布要“建立新中国”后两年，国民政府便迅速土崩瓦解，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从这时起，中国政局开始了一个由革命向建国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宣布一个建设时代的开始。^①毛泽东本人也一度断定：“革命时期的

^①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

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尽管“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①当然后来他又提出了“继续革命”的新见解。在从革命向建国过渡的时期中，蕴涵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奠基的一些关键的内容，它们必定要给新中国的对外关系造成基本而又独特的影响，同时为后续的历史留下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被磨去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新中国外交”就是革命和建国相互重叠时期的外交，它面对的外部世界是冷战，需要回应美苏全球战略博弈造成的有时是严峻的外部环境；在内部面对的不仅是革命运动的诉求，还有从革命向建国过渡时期的各种基本诉求。这些内部的基本诉求也决定着中国人对外部形势将做出何种反应。

如果从革命—建国的角度来定义这个过渡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起自辛亥革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特殊阶段，这是核心本质。新中国外交就是这个特殊阶段开始时期的外交，不论它面对何种外部环境，这个基本性质都是确定无疑的。如同20世纪的新兴民族国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亚洲新兴民族国家一样，这个阶段上的中国国家建设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而且民众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的和强烈的诉求，它们的影响在新中国的对外政策话语中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诉求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确保主权与领土完整。主权与领土完整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它们不能受到侵犯和损害，或者不能让它们受到的威胁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在这个国家生活的国民普遍感到不安全，或者感到没有基本的发展前途。如果说国家安全是新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之一，那么主权与领土完整则是新中国安全观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基础，也是国家不能受到威胁的首要内容。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革命一建国时期的大量案例都证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主权和基本安全的关注在他们的战略思维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地缘安全的理解相当深刻而且自然，对来自外部的威胁有足够的敏感。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这些决策的主观要素同外部变动的安全形势结合在一起，导致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决心必要的时候在周边地区实施强有力的干预，包括军事干预。新中国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决心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变得非常明确和坚决，因为这种对抗能够从国内获得广泛的支持。

其次是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进步，或统称为实现现代化。这也是新兴民族国家在当今世界保持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又有其特殊的历史重要性。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存在着实现现代化的特别强大的动力，除了个人发财致富这一基于人的本性的强烈愿望之外，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追求。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必须要为它服务，或者至少不能长时间与之背道而驰，这是新中国外交变动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因和基本动力。中共领导人从革命运动后期开始为中国未来发展选择的道路——以俄为师，在历史进程的这个重大时刻导致新中国在冷战中做出了“一边倒”的选择。其认知体系和到此时为止的政治经验等使他们相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在中国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除了“一边倒”没有其他的选择。

追求现代化是一个逐步展开的历史进程，在本书涉及的时间段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它们包括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所有制改造、制定和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等。将这些事件连接起来就是新中国国家战略的历史性转变，这在最深层次上决定着新中国对外政策的演变和发展。本书的叙述范围决定它不可能在分析这个阶段发生的每一个重大事件时都去触及这个问题，所以很有必要在此做一个宏观的勾画。

再次是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二战后亚洲一些新兴民族国家长期存在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艰巨使命，对于中国则尤为突出。

中国革命运动集政治革命、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于一身，后期名之为“解放”的战争在本质上也是一场统一战争。追求国家的完全统一无疑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推动力和目标，有时则是严重的制约因素。实现国家统一对于经历了近代外部力量巨大冲击的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是否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甚至是中国人判断任何外部力量的首要标准之一。

最后是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与国家认同的形成。二战后所有新兴民族国家都必定要经历一个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过程，并在已建立的核心价值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相对牢固的国家认同，包括对国家特性和基本形象的认知、认可甚至欣赏，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国家基本制度的信任和信心。二战结束不久发生的冷战使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并经常在一些国家导致极其尖锐的政治斗争。新中国同样立即面临社会核心价值建构问题，包括塑造基本的价值观、中国公众普遍认同的国家形象，并通过对外政策行为界定和建立与之相符合的对外关系，包括世界观、基本伦理和行为方式，等等。这方面的诉求在深层次上决定着新中国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反之，新中国外交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巨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正是通过一系列重大的外交决策，建构了新中国的三个持续到今天的基本身份和认同：社会主义国家，地区强国，新兴民族国家（现在称发展中国家）。它们成为当时和后来中国很多外交行为的依据和很多中国人的自豪感的来源。

二战后所有新兴民族国家的执政者都面临合法性的挑战。这些执政集团最初得到支持是因为他们在革命阶段满足了公众对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独立的诉求，但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能否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安全感、必要的荣誉感，以及满足国民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日益强烈的要求，则成为对其合法性的挑战之一。在中国也一样，任何执政集团的权力是否拥有合法性，都同解决那些基本问题、回应人民的基本诉求有关；执政集团提出和推行的各种